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兒幼不能執筆

二零一七年香港政府換屆，兩個月下來，社會秩序似有撥亂反正、回歸正軌之勢，套用一句陳腔濫調，就是「審慎樂觀」。行政長官計劃增撥教育開支數十億之鉅，時下流行俗語有謂：「錢不是萬能，無錢則萬萬不能！」教育為社會發展百年大計，只不過香港教育積習已深，千頭萬緒，真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單單一個錢字就可以解決問題，世情人情就太過簡單了！

姑且從幼兒教育說起，現時香港學齡前教育的最大毛病，是小孩上幼兒園、幼稚園就要面對過於繁重的課業。近年香港年輕家長最多掛在口邊的一句是：「不能輸在起跑線！」本欄曾經介紹，這不是什麼著名「教育學家」的忠告，實是源於台灣一個奶粉廣告！實情是，現在有些港孩為了種種原因，到了長大成人還不曾吃過一口母乳！這才是「輸在起跑線」呢！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哲學是「因材施教」，過去中國語文教育加入了許多歷代前賢出處行藏的小故事，我們老一兩輩的老香港或多或少知道每個人的人生發展道路不一樣，有人少年早慧，有人大器晚成。

傳說中甘羅年十二而拜相，姜太公八十始遇周文王。但是今天許多家長卻急功近利，追求「不能輸在起跑線」，一般不能接受寶貝子女當下還未能在學校眾同窗之間脫穎而出，苛求過甚，便常有「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之嘆。最嚴重的是子女上學唸書太辛苦，熬不到二十歲便自戕也是有的。較為輕微的是小

學年成績尚算能滿足家長的要求，上了中學之後就失去學習興趣，以後在常規學業上庸庸碌碌度過。

今天香港人比起父祖輩算是晚婚遲子，婦女三十歲以後才成家的比比皆是，婚後稍一拖延生育，每每年近四十才生第一胎。如果規劃下一代在三十歲左右就事業有成、出人頭地，這時老爸老媽已年近古稀了。當代香港父母於子女教育急於求成，還有這個晚婚遲子的先天不利因素。中國有千年開科取士的傳統，到了今天整個大中華圈仍然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想法，甚至日本韓國亦因曾經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有類似對年輕人學業要求過高的情況。世界變了，多上學唸書並得高學歷已不是獲得富貴的必然條件，對小孩自幼壓迫用功過甚，亦不見得是高效培育手法。回到香港，潘某人第一個建議，是請家長不要過早迫小孩執筆寫字！

少讀清代詩人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作者自述童年實況：「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鐫竹枝為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古人用「虛齡」，蔣士銓大概從三歲起學認字、背書。五歲才執筆寫字。當中還有用筆的差異，舊社會人人用毛筆，筆鋒軟而有彈性，不能用死力。現在小孩多用硬筆，容易誤用死力，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呀！

（再談香港教育沉痾・之一）

萃神乾坤
余似心

與子偕老

有否想過當我們年紀老邁，走向人生終結的一段路時，誰會與自己同在？

我們廝守半生的伴侶會在身旁嗎？兩個人中總有一個會較早離開，早走的一個便有伴終老，留下的另一個則要獨自面對餘下的歲月。

有些人會有兒孫在身邊相伴，但不少人縱有子女，他們也因為生活而未能騰出較多的時間照顧。加上無兒無女的，家人不在身邊的，壽命愈來愈長，很多老人或是孤獨一人，或大部分時間不是和家人在一起。

平常在街上，尤其是在公園所見，推着輪椅、攙扶老人的大都是外傭，當中尤以印傭為多，因為印傭多懂得粵語，可以和老人溝通。這是香港目前的普遍社會現象，年輕一輩無暇或無能力長時間照顧家中老人，便聘請外傭貼身侍候。

外傭的服務是全天候的，老人獲得

的照顧更仔細，包括飲食、清潔、餵藥，甚至聊天談心，成為老人的晚年良伴。就算是對年邁的公公，年輕的印尼女孩也都會細心照料。

我最近在醫院就見到不少外傭準時到達病房，為主人抹身、梳頭、餵食，嘘寒問暖，有些較到來的親友更殷勤。

有一天在公園，見到不少由外傭相伴的老人，令我分外感慨，想不到現代社會與子偕老的竟多是和自己不同國籍、背景截然不同、離鄉別井的年輕女傭工。



■誰與偕老 作者提供

劉某彪

而未破。2017年，警局重新開啟對此案的偵破，同時經過高科技比對鎖定了劉某彪。專案組民警之一的陳紅躍，已經由當年23歲的小伙子變成了45歲的老民警，「控制」劉某彪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可能能代表大多數的人：「有點懷疑自己的判斷」，「我沒辦法把他跟作家聯繫到一起，甚至感覺有點沮喪。」而主人公劉某彪，在被帶走時，沒有半點抵抗，只說一句「我在這裡等你們到現在」，同時拿出一封早已備好的、準備交給妻子的信，信中說「終於可以結束這麼多年來的精神折磨」。

儘管連警察都對此表示驚奇，說「辦過形形色色的案子，卻從沒見過作家殺人」，但這世上的事卻總是無獨有偶，比如最著名的另一個兇手作家、日本「少年殺人犯作家」永山則夫，就是在19歲的時候也是因為「純粹的金錢目的」以及對社會的仇恨和憤怒，在街上「無差別」射殺了4個人。入獄後的永山則夫開始唸書習字，後來成為了一名多產的監獄作家並引起轟動。

1997年，在經過漫長的巡迴審判和社會爭議後，48歲的永山則夫還是被處以了絞刑。濫殺無辜，罪無可赦，永山則夫也好，劉某彪也好，最終都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那也是他們應該和必須要承受的代價。但「應當」的背後，卻也有着無限的傷感。當年的永山則夫殺人案，被認為是上世紀60年代日本黑社會問題、槍支問題、少年犯罪問題和右翼對美民族情緒等問題的綜合體現，而劉某彪的心路歷程背後又有多少不為人道的社會原因？

無論如何，8條無辜人命逝去了，兩個人才毀滅了。真是哀傷。

采風

不同地方的教育制度

發式生活
高台DJ余宜強

香港的教育制度，近年也引起很大的爭議，不論是什么原因，最終都希望每位學生可以得到好的教育機會。

其實回想起自己小時候求學的階段，父母沒有給我們四弟弟任何壓力，我們都是自己督促自己努力求學，雖然成績不是名列前茅，但總算是過得去。

但今天因為社會環境的變遷，很多結了婚的夫妻，都只是生一個小孩，長期這種生育方式，不免會令到他們的小孩很容易被寵壞，而且把所有希望都集中在自己的小孩身上，所以任何對小孩學習有幫助的課程都讓他們去報讀，實際上幫助有多少，見仁見智。

其實有很多地方的小朋友，也未必有機會去上學，就如一些落後的國家，連有沒有東西吃的機會也不知道，哪有什麼可能給子女有求學的機會呢！

其實自己不太懂台灣的教学制度，但因為一些台灣的朋友在閒聊的時候，我們談到台灣的教育制度，雖然台灣已經可以令每個人都有求學機會，但他們也說，現在的家長總覺得只在學校吸收知識不足夠，總希望找一些覺得對子女有用的課程給他們去學習；但在台灣有些人會想到一些特

別的課程，希望可以吸引家長留意，其中有一個叫做「實驗教育機構」，他們所舉辦的課程，是希望學生在正規的學校以外能學到有關藝術及設計的知識，亦希望對這方面有潛質的學生，透過這些課程能啟發他們的思維。

坦白說，對於很多對藝術及設計有興趣的學生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學習，而且他們沒有什麼學歷的門檻，我覺得喜歡藝術及設計的人也應該不需要有學歷限制，因為藝術本身就是憑自己的觸覺去設計，不論任何年齡及學歷也可以有獨特的風格，雖然學識及眼界廣闊的人可能會有幫助。

但當我看到有關這些課程的面試要求，頓然覺得不舒服，因為他們要求家長跟學生一起面試，相信也是談論有關家庭的背景，而學費也相當之高，一季課程也要幾十萬台幣，便立刻有點好像把藝術文化變成商業了，因為我覺得收費實在太貴，最後又變成富貴人家子弟的課程。

其實人們去吸收知識，不論是以前的年代，或是今天的社會，吸收的能力我覺得也相距不大，所以家長們也不需要安排太多未必有用的課程給子女，只要知道他們的專長及興趣，就循着這個方向培育他們吧！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懷念父母親

我是一個十足的香港仔。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就前來香港從事教育工作，至今已七十年。加上兒時隨先父居留香港約四、五年，一生就是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香港。

因此，我雖然是個潮州人，但說的第一語言卻是廣州話。而且因外出和去北京參加多次全國人大會議，第二語言卻是普通話。說潮州話並不太順暢，在潮州鄉親相聚的時候，彼此的溝通還是廣州話。

現在我的兒女和孫子，都不會講潮州話，也不會自認是潮州人。就是我的兄弟們的家人，因為大多住在廣州和香港，也便把說廣州話作為第一語言和彼此溝通的語言。潮州話在我的家族已失傳。只有我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和繼母仍住在汕頭，其他的家人都在港穗兩地，因此講的都是廣州話。

我的大女兒現成為我的家族的聯繫人，她很熱心地聯繫家族中的長輩晚輩，但是她也不會講潮州話。只是她知道我的家族的傳統和各人的關係。有一次她能在廣州把家族中人聚在一起，拍了一張「全家福」，為我編輯一本先父的文集增添光彩。撫今思昔，看當年的多張家人的照片，不禁唏噓。老父已於一九九一年去世，大哥、二哥和老伴，也已先後辭世。一九六九年小兒子小欣與先父的合照，與當今小欣的兒子——我的小孫子海瑜的樣子一模一樣，可見人形遺傳的厲害。

我小的時候，先母曾說我的「頭毛」（頭髮）和腳甲（腳指甲）都像先父的。我長大後卻無從和父親比較，只是把這話當成母親的笑談。但遺傳是有的，比如先父年輕時曾以寫稿賣文為業，也教過好幾年的書，當過小學校長。我一生也從事教育事業，而且寫作不輟，這也許是先父的遺傳吧。

先母去世得早，先父又長年在家鄉汕頭工作，我與他們接觸實在不多，但身教言教還是有的。懷念父母親，只有努力工作，不辱家門好了！

子君式愛情

和凌玲看似圓滿的結局那麼沒有三觀，成為觀眾最為痛心的話題。還有一個唐晶讓人心疼得無以復加。這個把閨蜜的所有事當作自己的事來處理來維護的人，竟然搞不清自己的愛情有多輕多重。和賀涵好了那麼久，那麼久的時間裡兩人竟然一味在等。看他們曾經那麼理智地轉身與分手，再相遇再談婚論嫁，不要告訴我這就是愛情。十年的光陰，大概就是這樣的折騰。

說起，倒讓我想起身邊的一個故事。在小城，我認識一個叫艾草的女性。和羅子君遭遇不相同的是，艾草孝順能幹，出生的家庭十分和睦。因為愛情，艾草嫁給了同村的一個青年。婚後的艾草，眼看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她也想讓丈夫出去打工歷練下。恰好有個親戚在海南種水果，需要人幫忙看果園。此後丈夫出門打工，艾草一人留在家裡照顧公婆。大伯的媳婦在城裡工作，五歲的孩子被送回老家，婆婆看不過來，就扔給艾草，艾草對待大伯的孩子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她的婆婆在人前誇她能幹，不像娶來的媳婦，倒像自己的親閨女。艾草只是一笑，說這還不是應該做的？於是田裡家裡，院內場上，無不是艾草的身影。一個在家嬌生慣養的女孩，從此做了這家的頂樑柱。有一天，艾草發現自己懷孕了，孕期的艾草，挺着個肚子在農村的家裡跑來跑去，十月懷胎之後，艾草生下個男孩，在只有婆婆的照顧下坐完月子。

這一晃就是七年。七年中，丈夫每次回來都是形影匆匆。又過了幾年，艾草的丈夫不僅人去不歸，連手機電話聯繫也愈來愈少，總是推托工作忙。有個春天，孩子突然持續發燒，艾草打長途電話想讓丈夫回來，讓她陪着自己和孩子一起去省城看看。不料丈夫再一次托詞不能回家，艾草只好自己帶着孩子到醫院檢查。經過檢查，醫生說孩子病不重，只是淋巴腺有問題，需要好好治療。終於等到丈夫回來，還是半年之後。然而當地看到丈夫的時候，他那躲閃的目光讓艾草心裡一驚。這一驚就驚出事來，丈夫怯怯地提出離婚。艾草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問婆婆，想從婆婆那裡找到答案，婆婆罵兒子沒出息，不講良心，可罵過之後也沒別的辦法。

親情沒有挽回愛情，男人仍然在外面借口打拚不回家。在他提出離婚之後，艾草提出

要八萬塊錢孩子撫養費，只是象徵性懲罰而已，要把那麼幼小的孩子撫養大，何止是八萬塊錢呢？艾草離婚後，把孩子託付給母親，進城在商場找到一份收銀員的工作。收銀員艾草，就是這樣和我熟悉的。我在為她嘆息時，她已找到情投意合的人，那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先是當兵，退伍後進城參加了工作。艾草的婚後幸福與否，你只看她朗朗的笑聲和紅潤的臉龐就能知道，再也沒有比兩情相悅更讓一個女人神采飛揚了。

「會館裡的被遺忘在偏僻裡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着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這是涓生出逃之後面對子君的獨白。據說，《我的前半生》延續了魯迅《傷逝》裡的人物，可看陳俊生面對子君的眼神，縱然凌玲使出手段對他的前妻和好友卑鄙地報復，也看不出他有一點點悔恨，有一點點念着愛情的舊影。畢竟生活在當下，畢竟陳俊生所處的時代與環境跟《傷逝》中的涓生不同。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上海這個大都市大熔爐中，在收視率重於世道炎涼和三觀的編輯筆下，涓生已經遠去。那些棄山盟海誓而去的涓生們，有了憑信心計上位的凌玲，有拍拖十年都不離不棄的唐晶，再也不會有了「傷逝」這樣的矛盾糾結。對於他們來說，「傷逝」只能是壓在婚姻和靈魂上的沉重的音符，他們總能有能力有機會讓這個不和諧的音符戛然而止，好使沒有靈魂負擔的自己活得從容自然。

因此，在網上網下都在為羅子君惋惜的時候，我卻十分淡然。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羅子君，只要你有心去發現。只是這些現實生活中的羅子君們，沒有唐晶這樣好的閨蜜，更不用說有個孔雀男賀涵了。一旦被「陳俊生」們拋棄，不會有誰為她揩去腮上的淚水，不會有誰在她彷徨無助的時候去請她吃一頓幾萬塊錢的大餐。她們靠的，惟有自己的。所以，在還沒有被拋棄之前，她總得有個勤勞、善良，足以養活自己的技能和底子。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劇照

網上圖片

原來是太廟

不清了。但此刻卻變成永恒，在某種時刻，猛然跳進腦海，在心底溫情徘徊，久久不去。

記得電影院沒有冷氣，觀眾沒幾個人，空空蕩蕩的，顯得冷清。我還曾在這裡的露天籃球場觀看體育學院四隊的球賽，說是四隊，實際上是國家四隊，我因為六中的老同學林星禧是這隊的一員而去捧場。已經是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時他組織全國各地的歸僑籃球好手，於暑假期間到北京，組織隊伍，並且在北京籃球聯賽中出賽。當時，那露天籃球場就設在東長安街，靠近全國總工會那裡。但現在，籃球場消失了，便是全國總工會也遷走他方。

有一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我回北京，巧遇書展，在當地朋友的陪同下，去勞動人民文化宮購票排隊看書展。我們先在天安門前的東華表集合，人群擁擠，雖然講好地點，也差一點找不到了。東張西望一番之後，會合了才得以進入書展現場。露天書攤一個接着一個，我們看得眼花繚亂，也不記得買了什麼書。記得後來，逛完書展，要出去時，忽然看到售賣影碟的攤子，一看，竟有蘇聯電影《靜靜的頓

昨日紀
陶然

本來我只知道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它就在天安門東側，與中山公園一左一右，成為天安門的兩翼。那時我在南長街北京第六中學當寄宿生，走幾百步就可以越過中山公園、天安門，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非常方便。

後來才知道，太廟原來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廟，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佔地二百多畝，是根據中國古代「敬天法祖」的傳統禮制建造的。大殿聳立於整個太廟建築群中心，殿內主要樑柱外包沉香木，別的建築均為名貴的金絲楠木。但，當我徘徊那裡，印象最深的還是林木森森，松柏常青。那時，我會抽空去文化宮內的電影院看電影。記得有一次，去看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忘了什麼片。出來後，走到東長安街的街心公園坐下來。那公園對面便是團中央總部。公園寂靜，讓人在安寧中躁動。夜色漸漸深了，倚着夢幻喃喃，猶發青春溫暖狂想曲。夜籟一聲輕，一聲重，乍然，東方露出魚肚白，驚醒，暗想，倘若巡邏隊巡視而來查問，恐怕跳到黃河也洗

河》，分上中下三碟。我看過這電影，當下即買下，回港後重溫舊夢，但是已經是非一樣的心境，只覺得節奏好慢，大約是習慣了香港的快生活步伐，還是全世界也都不同往日了？

那年，我決定離京南下香港。臨行前，我在前門全聚德烤鴨店饒別鄰居，之後便順道去勞動人民文化宮聊天。忽然聽到腳步聲咯咯，由遠而近，這時我們正談論着什麼長什麼長，他問道，是什麼聲？我脫口而出，腳掌！

這時，秋陽暖暖灑下，秋風正掃過頭上松樹枝頭，嘩嘩作響。我全身暖洋洋，秋天的腳步愈來愈近了。



■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

網上圖片